

·文献学苑·

论《隶释》的文献学价值

李新伟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 100012)

摘要: 两宋之际洪适的《隶释》是我国古代一部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文献学著作,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原始碑刻资料。洪适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运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考释,从而使此书考证、校勘、补遗价值十分突出。

关键词:《隶释》 考证 校勘 补遗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8)06-0125-04

The Philological Values of the Emancipation of Slaves

Li Xinw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The Emancipation of Slaves*, written by Hong Shi during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was a momentous masterpiece on philology in the ancient times of China. There were plentiful original materials of stele conserved in this work. On the basis of these materials and by using many ways,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and explained them from different angles, which made this work had predominant values on investigation, emendation and addendum.

Key words: *The Emancipation of Slaves*; investigation; emendation; addendum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8)06-0125-04

金石学滥觞于两汉时期,不断演进,至两宋时期兴盛,其发展的明证便是金石学著作。宋以前并无金石学专著出现,至两宋时非但开始专辑成书,并且数量甚大。在众多金石学著作中,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是主要代表。不过,这两部著作仅存目录、题跋,不载原文,对后世研究者来讲可谓不无遗憾。于是,生活在稍后于欧阳修、赵明诚的洪适,莘莘访求三十载,立于欧、赵之肩,在政务之余,“复辨其文为之释”^[1]终成《隶释》一书——现存最早的一部集录和考释汉魏碑刻专著。

作者洪适(1117-1184),字景伯,号盘洲,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他自幼敏悟,能日诵三千言,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中博学宏词科。宋代博学宏词科须考试制、诰、诏、表、序等十二种文体,非学识渊博、文词清丽者,决无可能取得成功。自中博学宏词科后,他开始踏入政坛,从台州通判起,渐任朝中要职,于乾道元年(1165年)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一度显赫朝野。

《隶释》共二十七卷。卷一至十九是其主体,具录碑刻全文并附释文,内容上起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下至北魏明帝黄初、青龙年间,前后二百余年,列碑一百八十九,卷二十至二十七单录碑刻释文。卷二十辑录《水经注》中碑,卷二十一至二十二辑录《集古录》中碑,卷二十三辑录《集古录目》中碑,卷二十四至二十六辑录《金石录》中碑,卷二十七为天下碑刻目录。可见“是书(主体部分)为考隶而作,依碑释文,某处缺几字,悉为著明。各碑有跋(释文),凡切史事者多所论证,在金石文字中最为精博,碑以某字作某字,具疏于跋后,亦诸家所未及。”^[2]这对于文献学的研究意义十分重大,不但可用来考证史实、校正讹误,还可用以补史之缺与不足,正所谓“阅斯集者,可以游艺矣,可以消世虑矣”。^[3]

一 考证价值

《隶释》著录大量的汉魏碑刻原文,从而保存了许多原始资料,但亦有人认为这些资料多为“立传”之举,包含“多夸”等

不足之处,难以为之征信。洪适利用碑刻原文及有关资料对碑刻中相关问题进行考证,不但证明这些原始资料“可信不疑”,还考证出许多“史传之失”。

(一)多种考证方法的运用

实地考证的方法是一种极为清晰明了、有效的考证方法,洪适在书中大量运用了此法。如卷一《益州太守高联修周公礼殿记》释文云:

右益州太守高联修周公礼殿记,今在成都……

又云,郡将陈留高君者高联也,诸书多有误以联为朕者,朕再做古室,在文翁石室之东,又东即周公礼殿,规模古质,井斗并制,柱皆削方,上狭下广,此记刻于东南一柱,亦木尔。欧阳氏以为文翁石柱记者,误也。自兴平甲戌至于乾道丁亥,千有三年,殿宇岿然如故,由唐显庆以来,以孔子为先圣,今礼殿无周公像,政和中郡守席贡请诏封文翁为庐江伯,高联为陈留伯,在从祀之列云。

此段文字中作者就以实地考察所得第一手资料,详尽考证了高联即为陈留伯,文翁为庐江伯,欧阳修误录《文翁石柱记》为《益州太守高联修周公礼殿记》。从而不但使得碑中的“高联”其人大白于世,还纠正了欧阳修《集古录》中的相关讹误。

《隶释》是以《水经注》、《集古录》、《金石录》所录碑刻为蓝本,用自己所搜碑刻加以验证,再辅以前者未收之碑进行补充而成书的。这些验证既反映了洪适对待所收录碑刻资料的严谨态度,同时也使得他能够大量运用他证法来进行考证。如卷二《樊毅修华岳碑》释文载:

碑云,有汉元舅,五侯之胄,射阳之孙。按范书樊宏封张侯、樊丹射阳侯、樊寻玄卿侯、樊忠更父侯、樊茂平望侯,樊氏者,凡五国,毅即丹之后也。《水经》云,泚水西南流,射水注之。《诗》所谓申伯番番,既入射者,樊丹封射阳,即其国。又云自广陵,出白马湖,迳山阳城西即射阳县之故城,高祖封项缠为射阳侯,乃其地。

洪适以《樊毅修华岳碑》为基础,借助于《后汉书》、《水经注》等、《诗经》等相关典籍的记载,运用他证法详细考证,从而得出樊毅即为樊丹后代的结论。

无论是实证法,还是他证法,终究只是考证方法的一种,虽不乏其单独行文的必要,但更需要融通一体,综合运用。洪适在多数释文中就把两法杂糅到一起,共同考证,以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将二者分割开来。如卷十九《魏受禅表》碑释文中洪适就不但引用了《汉纪》、《魏志》、裴注《三国志》、《水

经注》等资料,还利用大量实地考察的碑刻相关内容,共同进行考证,从而驳斥了传统论者“附会符命”之谬论,得出碑文所载魏受禅日期极为可信的结论。

(二)丰富内容的保存,为后世考证提供珍贵资料

《隶释》著录以汉碑为主,其碑文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而这些资料今多已亡佚,于是这些碑刻之文就成为今人考证史实的珍贵资料。同时,详尽的碑刻释文载记也保存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大大便利了后人进行考证。

《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论语》等经文原版内容早已亡佚,加之“学者各习其师,故其文不一”^[4]造成后来流传于世的经传各异,令人无所适从。而《隶释》卷十四大量著录了有关《尚书》、《诗》、《礼》、《公羊传》、《论语》等石经残碑碑文。这些残碑经文是汉灵帝集群儒之力校正,并精心刊刻于石碑之上的,可谓当时最佳的经传定本,也是流传中较好的一种本子。它的存录,加上洪适的校勘,不但为考证流传各异的种种经文提供了优秀的版本,还为考证有关经传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除卷十四外,《隶释》还保存了丰富的其它方面文献资料,这些资料也很利于后人进行考证。如关于高彪,《后汉书》载记:“高彪,字羲方,吴郡无锡人也。家本单寒,至彪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于言……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因事讽谏,灵帝异之。”^[5]在卷十《外黄令高彪碑》中关于高彪侍儒苦学的记载,不但与《后汉书》基本吻合,印证了范曄的记载无误,而且更加详尽,有助于后人开展相关研究。

另外,它还存录了许多同类相关载记,便于后人进一步做专题研究。在《隶释》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卷十著有《幽州刺史朱龟碑》并释文,卷二十又辑《水经注》酈道元关于朱龟碑释文,卷二十一再辑《集古录》欧阳修所书朱龟碑释文,卷二十三再录欧阳棐《集古录目》中朱龟碑释文,卷二十五赵明诚《金石录》关于朱龟碑释文亦照载于下。诸如此类著述颇多,为后人展开专题,尤其是关于碑刻本身的比较考证研究,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二 校勘学价值

自汉金石学肇始就有文字考释,至宋欧阳修又开运用金石资料进行校勘之先河,到赵明诚的《金石录》更有“今石本既已磨灭,而岁久转写,日就讹舛,以世所传经书校此遗字,其不同者已数百言。”^[6]这些对善于向前人与时人学习和借鉴的洪适来讲,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在《隶释》中,洪适用大

量专文来校碑中讹、脱、衍、倒者,从而保存碑文原貌。

(一)丰富的校勘内容

《隶释》在释文之后往往有许多专门关于异文字体的考校,如卷一《济阳太守孟郁修尧庙碑》达十六字,卷三《楚相孙叔敖碑》多达二十字。同时在碑文、释文之中亦存有大量的校勘内容,不仅涉猎史事,更以文字的讹、脱、衍、倒为主。

如卷一《成阳灵台碑》释文有:

淮南子墜形训载海外三十六国西北方有无继民,碯鱼在其南。注云,碯鱼如鲤鱼,有神灵者乘行九野,碯读如蚌字,书蚌或作蚌,碯无蚌字也,所谓蚌鱼疑即此尔。碑称汉代修祠之后蚌鱼复生,故有灵台啬夫鱼师卫仕驿宪蚌鱼服之延寿,疑仕当读为士,宪当读为献也。

又如卷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释文曰:

此碑子肃之上有两字,不甚明,上一字仿佛是恭,其下颇类成字,但汉人无二名,而金恭有墓阙及残碑,皆云恭字子肃可以证季本之子,字子肃者,即金恭也,但恭下多一字所不可晓。

再如卷十七《富春丞张君碑》释文言:

此碑先已装剪,不无颠倒去者,三年之下盖有阙文也。

诸如此类校勘资料,在该书中俯首皆是,而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无疑将极大有补于后世研究者。

(二)灵活多样的校勘方法

灵活多样的校勘方法的应用,是洪适在《隶释》中进行校勘的一大特色。

作为校勘各法之基础的对校法,文中运用相当广泛。如卷十四《石经公羊残碑·隐公篇》载:

石蹟[板本作碯]立[下阙]美大之辞也,棠者何济[阙一字]之邑也,曷为[下阙]仲子[板本有也字]。

在此碑释文中洪适还明确表示“石文断续,不可考绎……以今板本校之。”也就是说,作者拿当时通行的孔氏版本与石经公羊残碑进行了认真对校,所校异文,如“板本作碯”、“板本有也字”等,均照录于碑文之中,从而保存了碑文的原貌。

他校法是书中最主要的校勘方法。《隶释》所录汉魏碑刻共一百八十九,其中一百六十多个在酈道元的《水经注》、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有录(仅存录释文)。这使得洪适以酈、欧、赵之书与自己搜集到的原始碑文相对照,运用他校法进行大量校勘成为可能。当然,在他校过程中洪适还引用了大量经史子集类著作和其它原始资料。如卷三《无

极山碑》释文与卷八《慎令刘修碑》释文分别载:

颜之推谓《诗》之有‘萋萋兴云祁祁,当时兴雨。’赵氏据此碑云,汉以前本皆作兴云,因颜氏改之。予按左雄传,已作兴‘雨祁祁’,则汉代言《诗》者不同,由唐以来本始以‘兴雨’为正,非因颜氏也。

此碑云‘乡党遯遯如也’,祝睦碑则云‘党遯遯’,皆与《论语》异,而二者又自不一,盖师说然也。

前者洪适引用《汉书》“兴‘雨祁祁’”,并根据《诗经》的相关版本资料,得出长久以来即以此为本来,并不存在改正的问题,从而批驳了赵明诚之误,为他校法广泛运用提供了范例。后者洪适运用慎令刘修碑“遯遯”与祝睦碑“遯遯”相对,虽未有定论,亦很好运用了他校法。

作为博览群书的一代鸿儒,洪适在《隶释》中亦广泛运用了理校法。如卷二《桐柏源庙碑》释文言:

碑云,奉祀禘絜,字书无禘字,以文意推之,当为斋戒之斋。

这里洪适针对所校内容,从文字学角度寻找佐证,认为“字书无禘字”,并据自己对文意的理解推出其字当为“斋”,实为理校法的典范。

校勘过程中每一种校勘方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更是综合运用,共同解决难题。如卷四《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释文中洪适就同时使用他校、理校两种校勘方法进行校勘,共同佐证汉注“傳元二之灾”中的“元二”为“元元”之误,解决了仅靠单一校勘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为后世校勘者提供了经验,促进了校勘学的发展。

(三)多闻阙疑的校勘原则

作为金石大家,洪适的求精求实审慎态度在《隶释》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前文所述的考证中就已经很好体现了这一原则,在校勘中更是如此。

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异文处理上。如卷十二《杨震碑阴》释文载:

汉碑刑、形、邢三字多互用。此碑有刑升高,刑公节,疑若借用作邢。

此处作者以“疑若”贯穿结论当中,显然是多闻阙疑原则的体现。

其次,表现在释文中。尽管在释文中洪适运用了对校、他校、理校多种校勘方法,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避讳学、历史地理学等多角度来校碑文舛误,但仍认为“书不可以意轻改”,对于没有足够实证者多以疑问形式而存之。如上所述卷一《成阳灵台碑》释关于“”、“仕”、“宪”等字的校勘就很好体现

了这一原则。又如卷八《金乡长侯成碑》释文语：

今此碑与史不同者四，盖所引鼻祖前朝之事，
 无闻见所接故也。西汉表平帝封侯辅为明统，俟此
 辅为酺，未知孰是。

此处洪适校“辅”为“酺”的过程中未有充分的资料依据，故本着多闻阙疑的原则而得出“未知孰是”的结论，共录“辅”、“酺”二字于同文中。

再者，表现在碑刻原文著录中。如上所述，在卷十四所录石经残碑中，作者对照不同版本，以审慎的态度，校补碑刻原文，用存疑的方式进行著录。

三 补遗价值

金石资料不但具有考证、校勘的功用，同时亦包含“补载籍之缺佚”之功能。欧阳修就曾利用金石资料“与史传相参验证，见史家阙失甚多。”^[7]《隶释》中所存录的丰富内容，除了可补前人金石学著作有关汉代碑刻之不足，还对史书及他书有很重要的补遗价值。

司马迁为作《史记》而搜罗许多原始资料，其中就包含大量的碑刻、墓铭。《隶释》所存录汉魏碑刻自然亦可补史书之缺与不足，特别是补有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如樊毅在《后汉书》中并无专文记载，仅在卷三十二《樊宏列传》中略有提及，《隶释》卷二《樊毅变华下民租田口算碑》碑文所记相关内容则可补其缺。如：“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王弘农太守臣毅……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从中可知，樊毅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十一月就任弘农太守一职，而《后汉书》并未载记。

非但可补以正史为主的种种史书之不足，《隶释》亦可对其它古代典籍进行补充。如西晋陆机《洛阳记》关于汉刻石经的流传记道：“凡四十六《书》、《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毁；《论语》三碑，其二毁；《礼记》十五碑，皆毁。”^[8]但对于该石经在其它时期的流传情况并未详载。在《隶释》卷十四《石经尚书残碑》释文中则详细地记载了从“北齐徙之邺都”，至“隋复载入长安”，再到“唐初魏郑公收聚之”以及“本朝一统时”汉刻石经的流传情况，从而使汉刻经文流传有一完整清晰的脉络。

在《隶释》中虽多数是以碑文、释文补史书及他书之缺与不足，但以史书、他书补碑文之阙与不足在文中亦有相应的述说。如卷二《东海庙碑阴》云：“阙者，秦始皇所立名之秦东门，

阙事在《史记》。”即说明可用《史记·秦始皇本纪》来补《东海庙碑阴》的阙文。

当然，百密难免一疏，在《隶释》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如《金薤琳琅》卷三《韩敕碑阴》释文有言：

一《隶释》始曲成侯王嵩、洛阳王敬，予家本则始涿郡太守鲁廙，次公终河南樊文高，又有大不同者，岂《隶释》得之，传录故有此误，要当以搨本为是。^[9]

此辑即对《隶释》中出现的考证之误进行了评述。这类问题在清代考据大家钱大昕、黄丕烈、顾广圻、王鸣盛等人的著作中亦有不少记载，兹不一一赘述。

另外，《隶释》在校勘过程中亦存在不少纰漏之处。如卷六《郎中郑固碑》释文中关于“逡巡遁逃”的校勘，事实上在前人著作《管子·桓子》、《汉书》、《集古录》等中均有明载，“逡巡”当为“逡循”，此处再次出现此类错误确属不该。

百醇一驳，然不害其宏旨。宋时洪适研究古文献达如此高之水平，取得如此多之成就，已经十分难得。况流传于今，其中缺失并非完全由洪适本人造成的，“不足以为适病矣”。^[10]

参考文献：

- [1] 洪适. 盘洲文集·隶释序[A].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58册[Z].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478.
- [2] 耿文光. 万卷精华楼藏书记[Z].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1841.
- [3] 王云鹭. 刻《隶释》小序[A]. 隶释[Z]. 北京：中华书局，1998：2.
- [4] 洪适. 隶释·慎令刘修碑[M]. 北京：中华书局，1986：96.
- [5] 范晔. 后汉书·高彪传[M]. 上海：中华书局，1965：2649-2650.
- [6] 赵明诚. 金石录·汉石经遗字[A].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81册[Z].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71.
- [7] 欧阳修. 文忠集·与刘待读[A].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103册[Z].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514.
- [8] 洪适. 隶释·石经尚书残碑[M]. 北京：中华书局，1986：151.
- [9] (明)都穆. 金薤琳琅·韩敕碑阴[A].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83册[Z].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242.
- [10] 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隶释[Z]. 北京：中华书局，1965：735.

作者简介：李新伟（1976-），男，河南鄆城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武警北京指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